



# 大湖西 (连载)

杨义堂



过去在丰、沛、萧、砀、鱼五县成立联防办事处时期，冯子固任办事处主任，陈筹任办事处办公室主任，二人很熟悉。陈筹找到冯子固家里，动员冯子固出来重新抗战，恢复国民党的县政府。而冯子固不想再抗日了，而是打算当一个乡绅，置办一些土地，优哉游哉，不再过问政事。陈筹三番五次来冯子固家做工作，还让冯家的族长劝冯子固以民族大业为重，树立抗战的信心，坚决抗战。中共沛县县委组织人员把他原来的枪支收集起来交给他，支持他官复原职，继续当国民党的沛县县长。冯子固看到了共产党抗战的决心与合作的诚意，也觉得有共产党支持，抗日一定会成功，于是决定再度出山，成立国民党沛县政府和保安总队，一下子竟然拉起了三个团、三千多人的队伍。

在共产党的支持下，国民党砀山县县长窦雪岩也重新上任，拉起了千余人的砀山县保安队。

铜山县政府西北片区办事处副主任兼民众自卫队大队长耿继勋外号“耿聋子”，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，没等共产党去劝说，他就趁势恢复了两千余人的铜山县保安队。

国民党丰县代县长兼常备队大队长黄体润对义勇队坚决抗日、纪律严明深表敬佩，他在1938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贞乾抗日情绪较高，其部下纪律又佳，将来成功必多也！”在8月1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：“贞乾函约在李新庄密商要事……沿途民众对抗日人民义勇队纪律赞不绝口，贞乾声誉日著，得此良朋，亦颇引为庆幸也！”

冯子固看到共产党纪律严明，思想统一，战斗力强，主动要求共产党派遣一批政工干部到自己的队伍里帮助整顿军纪，加强思想工作，提高官兵军事素质。1938年8月，沛县县委派朱煜如等20余名优秀党员干部进入其第一团——胡子良团，选派张涵广、葛步海等人进入其第二团——吴品山团，也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其第三团——丛维三团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，胡子良团的党员发展到100余人，从团到连建立党组织，团部还建立党总

支，团长胡子良把两个儿子也送到八路军的部队里。

统一战线建立后，国共两党还在沛县开办苏鲁边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，对抗日官兵进行培训。学校开设政治、军事、民运等课程，教员分别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担任。第一学期培训学员200余人，主要是丰、沛县的学生和青年，培训两个月结束后，有的被派往部队，有的被分到各县做民运工作，还有的在地方组织自卫团。1938年8月下旬，冯子固在龙固集开办了苏鲁边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，共产党派朱煜如为指导员，负责政治思想工作，派朱华、魏定远为教员。两期培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丰(县)沛(县)等地的抗日骨干。

国民党沛县第五区原来的区长慑于日伪势力，不愿再当区长。县长冯子固找到时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的郝中士和苗宗藩等人，请共产党给选派一名区长，中共沛县县委派共产党员李剑波赴任。李剑波到任后，发展和任用共产党员担任乡、保长，很快建立了以共产党主导的区、乡、保三级政权。全区的10个乡长中有9个是共产党员，108个保长中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，区公所助理员、通讯员也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，他还在五区建立抗日群众组织，成立了区中队和乡、保自卫队。沛县五区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红五区”。

丰县二区区长兼区中队队长是李贞乾的弟弟李坤若，单县潘庄区由共产党员王存典任区长，单县辛羊庙区区长朱筱舫是倾向我党的国民党爱国人士，加上沛县五区，这四个地方是我方活动的势力范围和供给基地。

在沛县和丰县交界处有一条大沙河，大沙河东岸有一个鹿楼村，距离丰县和沛县都是三十里，有一条大路连接丰沛两县，是客商必经之地，村里的十字长街上店铺林立。1939年4月，驻沛县县城的日军组织春季大“扫荡”，4月28日，驻沛日军与丰敌一部合计兵力约千人，在扫荡结束后，由丰县带着抢夺的物资回沛县。

(未完待续)

## 济宁成语故事

### 温故知新

师襄与孔子都是鲁国有名的乐官。师襄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，闻名于诸侯。一天，孔子来拜访，两人谈论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弹琴上。说到激动处，师襄从身边拿过琴，弹奏了一曲。孔子在一旁聆听，感觉此曲出神入化，非同凡响，于是决定向师襄学习。

弹奏了大半个月，师襄觉得孔子的弹奏水平相当好了，说：“这首曲子你已经熟练掌握了，学一首新的吧！”孔子回答：“曲调是学会了，可是奏曲的技巧还没学到位。”

过了几天，师襄觉得孔子的弹奏技艺熟练了，劝他学首新的。可是孔子还沉浸在曲调中，好一会儿才回答说：“我还没有能完全领悟这首曲子的神韵。”

又过了几天，师襄再次劝他：“你的弹奏中，神韵也有了，可以学习新曲子了。”但是，孔子还是坚持练习这一首曲子。

终于有一天，孔子在琴声缭绕中站起来，遥望远方的天空，许久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已领悟到作者的精神风貌了，这样的曲子，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得出来呢？”师襄听后大吃一惊，他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对着孔子连连作揖道：“是呀，是呀，我的老师向我传授此曲的时候，说此曲的名字正是《文王操》！”



掌故知鲁

### 曲阜碑刻(八十三)

## 正德四年重修颜庙碑

刘晓阳

正德四年重修颜庙碑，位于颜庙中院西碑亭内。碑高3米、宽1.3米、厚0.38米。碑文为正书，共有16行，行42字。碑文记录了颜庙的修缮过程，强调了颜回的品德及其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，以及修缮颜庙的重要意义。

“朕闻孔子之道与天井，当时唯颜子、曾子得其传，其后则有子思、孟子。而颜子所得深且粹矣”，碑文首句既点明了碑文是由正德皇帝亲自撰写，也展现了颜回在孔门弟子中的独特地位。颜回是孔子最为喜爱和得意的弟子，这在《论语》中多有体现。鲁哀公曾问孔子，孔门弟子中谁最好学，孔子答道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颜回因为英年早逝而未能留下著述，碑文提到的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则“得之皆有著述，以垂世立教”。随后，正德皇帝化用了孔子的话，指出“无言之教”胜于“以言为教”的道理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使圣人之道，果不在于言乎？则几于晦。果在于言乎？则几于浅。然则以言为教，又不若无言之教之深且粹也。”这样，实行“无言之教”的颜回便是“发圣人之蕴，教万世无穷者”。正因颜回的境界之深、贡献之大，所以正德皇帝要“述其事于碑，以阐颜氏之功”。

在孔子弟子中，颜回最先受到帝王的尊崇。公元前195年，汉高祖亲临曲阜祭祀孔子时，便以颜回配享。贞观二年(公元628年)，唐太宗尊颜子为“先师”，并以颜子配享孔庙。《尼山大成殿增塑四配享之碑》云：“颜子之侑坐，肇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冬，尚书左仆射房玄龄、国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议也。”

这里的“侑坐”就是配享。唐玄宗开元十一年(公元723年)的《御制老孔颜赞》残石记载了唐玄宗所撰颜子赞：“杏坛槐市，儒术三千。回也亚圣，丘也称贤。四科之首，百行之先。秀而不实，得无恻哉。”大中祥符元年(公元1008年)，宋真宗于泰山封禅之后即来曲阜祭祀孔子、周公，加封孔子为文宣王，周公为文宪王，颜子为兖国公。咸淳三年(公元1267年)，孔庙四配制度确立，颜子为四配之首。至顺二年(公元1331年)，元文宗加封颜子为“兖国复圣公”。今曲阜颜庙复圣殿前有至顺二年九月所立《大元加封兖国复圣公制词碑》，碑文曰：“朕惟得孔氏之门，入圣人之域，颜子一人而已。观其不迁怒、不贰过，以成复礼之功；无伐善、无施劳，益著为仁之效。盖将不日而化矣，惜乎天不假之年也。”出于“缅怀哲人，留心圣学，将大新于风教”的初衷，元文宗尊崇孔子等圣哲，于是将颜子“加封兖国复圣公”。嘉靖九年(公元1530年)，明世宗对孔庙祀典

进行改革，去除孔子的“大成”“文宣王”封号，只称“至圣先师”，将塑像改为木主，颜回也改称为“复圣颜子”。清代以后，曲阜大成殿孔子、四配、十二哲塑像又全部恢复。

颜子庙始建年代不详，东汉祢衡撰有《颜子庙碑》，赞颂颜子德行“亚圣德，蹈高踪”，由此可知，当时已有独立的颜子庙。天保元年(公元550年)，北齐文宣帝令鲁郡以时修葺颜庙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的较早的颜庙规制，是金明昌四年(公元1193年)的记载：“正殿翼然而所立卓尔，四檐崇起而如翬斯飞。其制度也简省，其规模也宏远。虽无山节藻梲之华侈，刻镂雕文之奇巧，梁栋坚固，可历年久。”从上述记载看，颜庙的建筑极为朴素，也很符合颜回生前所居住的陋巷的风格。金末，颜庙则“兵后颓废，瓦砾而已”。元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提倡儒学，并重建了颜庙。明清两代，颜庙也得到了多次重修。

正德四年重修颜庙碑，不仅是颜庙建筑的修缮记录，更是对颜回品德与学说的崇高颂扬。颜回作为孔子最杰出的弟子之一，虽未留下著述，却以“无言之教”深刻影响后世。自汉至清，颜回的封号与相关祭祀规格几乎在不断提升，其精神内涵也愈发深入人心，颜庙也见证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与推崇。如今，颜庙依然屹立于曲阜，成为人们缅怀先贤、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，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，激励着后人继续弘扬儒家的道德与智慧，让颜回的品德与学说继续焕发光彩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。